

1947 年 8 月 15 日，德里

1947 年 8 月 14 日，在这个不寻常的一天的不寻常的时刻——午夜时分，印度议会在新德里召开全体会议。自 1946 年起任临时政府副总理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会上发表了著名演讲。该讲话此后一再被引用。尼赫鲁说：“很多年前，我们曾与命运相约。如今，实现诺言的时刻终于来临。虽然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地践约，但其中最根本的部分将成为现实。子夜，整个世界都在沉睡之中，印度却为了生存和自由而醒来。这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时刻：我们将摆脱旧体制的束缚，迎接新体制的到来。一个时代结束了，长期受压迫的民族之魂得到自由和解放。在这个欢庆的时刻，我们宣誓要效忠印度及其人民，要为人类鞠躬尽瘁。……为了实现梦想，我们必须工作，艰苦地工作。这些梦想涉及印度，也涉及整个世界，因为所有国家和民族都紧密相连，没有哪个民族可以独自为政。常言道，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同样，世界上的自由、幸福和灾祸也是不可分割的，当今世界四分五裂的状况不会持续太

久了……”

尼赫鲁虽为印度在这一夜获得自由做出了卓越贡献，但这个日子却是由英国驻印度最后一任副王路易斯·蒙巴顿勋爵选定的。这天是日本投降两周年纪念日，蒙巴顿曾于两年前作为盟军太平洋地区最高统帅接受了日本的投降。由于蒙巴顿辖区内有两个国家走向独立，因此，他于8月14日首先赶赴卡拉奇，参加巴基斯坦的独立仪式，然后又及时赶回新德里，并于午夜赋予印度自由。独立日期虽为蒙巴顿选定，但具体时辰却由星占学家负责挑选，他们的建议对于此类幸运时辰的选定一向是不可缺少的。

参加午夜议会的全是印度议员。人们欢庆祖国的独立。对尼赫鲁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这个中等个头、身材瘦削的男人身着印度北方的民族服装——大衣长短的紧身夹克，以适宜自己的方式进行演讲。他不紧张，也不故作，显得那样深思熟虑和从容不迫。他本是个易怒的人，但此刻毫无理由动怒。这是长期企盼而终于实现的时刻。然而，祖国的分裂冲淡了这种欢乐。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伟大领袖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认为没有理由庆祝，国家的分裂深深地震撼了他。正当首都人民欢庆自由之际，甘地正在为维护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和平而奋战在孟加拉。

自1923年以来，印度一直谋求自治。现在它终于与巴基斯坦一样获得了自治权，成为英联邦的自主成员。尼赫鲁及其他议员于午夜集会之后前往副王府，蒙巴顿将成为这个新国家的首任总督。负责正式邀请蒙巴顿接受新职

务的制宪议会议长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博士说到一半就顿住了，尼赫鲁站在普拉沙德与蒙巴顿之间，几乎半坐在蒙巴顿的写字桌上给普拉沙德提词。蒙巴顿欣然允诺之后，尼赫鲁交给他一个硕大的信封，说信封里装着第二天清晨即将宣誓就职的新政府成员名单。虽然蒙巴顿早已了解了组阁情况，但出于好奇，他仍然在尼赫鲁和议员离开之后立即打开信封。信封内空空如也。原来，尼赫鲁在民族命运攸关之际一时忙乱，忘记将内阁名单装入信封了。^②

真正的庆祝活动始于 8 月 15 日清晨。蒙巴顿宣誓就任总督并发表演讲。他在讲话中特别提到甘地，高度赞赏甘地在孟加拉做出的贡献。接着是普拉沙德讲话，最后举行了印度新国旗的升旗仪式。下午，所有人都聚集在罗山那拉花园。蒙巴顿一家向孩子们散发甜点。蒙巴顿之女帕梅拉在拥挤中几乎窒息，还是尼赫鲁及时为她解了围。人们再次升起印度国旗。正当旗帜在风中飘扬之际，一道彩虹横贯长空，与旗色交相辉映。上苍的显灵使人们更加欢欣鼓舞。

第二天，8 月 16 日，星期六。尼赫鲁在莫卧儿王宫——红堡的讲坛上发表重要演讲，近 50 万民众前来听讲。紧接着蒙巴顿勋爵飞抵孟买，与即将离印返英的第一批英国士兵告别。当时的场面是轻松愉快的。蒙巴顿没有笔挺着身子检阅部队，而是像在以往的战争中一样，站在士兵们中间的木箱上与他们告别，祝他们好运。下午，蒙巴顿总督在孟买的泰马哈饭店举行招待会。其间，蒙巴顿访问

孟买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城。在蒙巴顿结束招待会返回总督府的途中，8公里长的道路两侧挤满了欢呼的民众。因为印度人民知道，蒙巴顿不再是英殖民统治的代表，而是他们的总督。自由使仇恨消失，与英国人平等的感觉复苏了。蒙巴顿及其陪同尽管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感到惊诧，但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切。

蒙巴顿勋爵之所以急于完成他在印度的使命，是为了尽早实现其人生最终目标——成为英海军司令（第一海务大臣）。其父巴滕贝格亲王曾于一战初担任此职。尽管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婿，但后来不得不因其德国血统而放弃该职。1946年，当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请求蒙巴顿勋爵出任驻印最后一任副王时，蒙巴顿对此并不感兴趣，因为他担心他的海军前程将就此被耽搁。为此，蒙巴顿后来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其中包括：（一）英政府保证蒙巴顿追求的事业不会受阻；（二）明确宣布给予印度自治权；（三）宣布印度独立的具体日期。英政府在此之前一直回避就印度独立问题作出明确答复，现在却被迫摊牌。

艾德礼执意派蒙巴顿勋爵赴印，旨在为其所在党——工党开脱，以免社会各界将“日不落帝国”的解体归罪于工党。^③

蒙巴顿作为高级将领和国王的堂弟显然是最合适的人选，连保守党也无法指责他。在蒙巴顿的敦促下，英政府将印度独立日预定在1948年8月，议会也迅速通过了相关法律《印度独立法》。当时英政府并没有分裂印度、成立巴基斯坦的构想，分治是在蒙巴顿的任期内进行的。蒙

巴顿坚信不分裂印度就无法完成其使命，一心致力于分裂活动，且使各方都处于时间压力下。蒙巴顿将独立日期提前一年，定于 1947 年 8 月 15 日。他在会议室里悬挂了一份日历，上面没有日期，而是显示到印度独立日还剩下的天数。人们以军事的精确性进行着分裂的筹备工作，这被圣雄甘地称为“印度的活体解剖”。

人们安然庆祝了独立日，不料第二天风云突变，远方的惊雷预示着印度即将遭受疾风骤雨。

蒙巴顿将大法官丝瑞尔·拉德克利弗撰写的关于印巴边界线分布的报告递给尼赫鲁及其他内阁成员。其时，巴基斯坦总理里雅格特·阿里·汗也在场。蒙巴顿故意推迟了将报告转交给他们的时间，因为他想在两位政治家就边界划分争吵起来之前先把权力分别移交给他们。就这样，两个国家在不清楚边界如何划分之前首先走向了独立。双方均对边界划分表示极度失望。第一批关于边界冲突的消息也纷至沓来。尼赫鲁和里雅格特·阿里共同前往旁遮普省，了解当地局势。

当旁遮普省的锡克人得知他们的居住地被国界线分为两半时，不断对此提出抗议，表示无论如何也不愿留在巴基斯坦。锡克人首领塔拉·辛格在拉合尔的本族集会上抽出宝剑高呼：“这意味着战争！”运送北印度穆斯林难民前往巴基斯坦的火车遭到锡克人的袭击。来自两个方向的难民潮撞在一起，致使杀戮迭起。边防军疲于奔命，蒙巴顿最终同意将其解散。至此，蒙巴顿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项行政任务。他带着随从前往西姆拉，准备在那里度假。然

而，蒙巴顿尚未抵达目的地，尼赫鲁及其内政部长帕特尔就紧急请他返回，因为难民队伍已到达首都新德里。政府已无力控制局势。

作为二战期间盟军太平洋地区的最高统帅，蒙巴顿极善应付这种局面。他组建内阁危机小组，并应尼赫鲁的请求亲自担任小组主席。但他坚持不对外公开新身份，因为实际上他是在履行政府首脑的职责。9月份，危机小组几乎天天开会，噩耗接踵而至。成千上万的老德里穆斯林拥进老城堡，以躲避锡克人和印度教徒的报复行径。疫病威胁着人们。北印度的穆斯林纷纷前往巴基斯坦。不仅火车爆满，公路上的人流长度也超过100公里。很多家庭赶着牛群一起上路，但在边境桥边却不得不忍痛将牛留在印度。除不同教派的狂热分子外，威胁难民的还有强盗。当时约有1000万人步行，几十万人乘火车逃难。

决定印巴分治时，人们完全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一次民众大转移。约三分之一的穆斯林留在新独立的印度，旁遮普省东部邻近的北方邦约有17%的穆斯林，他们主要居住在城市里，其中很多人已逃往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难民所到之处给当地政府造成很大麻烦。除了维持秩序，当局还得保证他们的起居和饮食。

在那个年代，令人悲叹的误会每天都有发生。如地处最东边的吉大港的山区居民在独立日升起印度国旗，之后却愤怒地得知，他们被划归巴基斯坦，尽管他们不是穆斯林。

至9月底，难民潮有所减退，蒙巴顿的危机小组也结

束了其使命。尼赫鲁重新行使政府首脑的职责。与旁遮普省的骇人事件相比，孟加拉的局势相对平静。这主要归功于圣雄甘地。他没有在新德里，而是在孟加拉度过了独立日。他从道义上向孟加拉总理沙西德·苏拉瓦第（穆斯林族）施加压力，强迫他与自己一起阻止教派冲突。他们的努力获得极大成功，加尔各答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最终握手言和。蒙巴顿评论甘地的成功时说，甘地在孟加拉的收获远胜于派遣几个师的效果。但甘地不可能无所不在；他无法阻止旁遮普省的骇人行为。当然，那里的情况也有别于孟加拉。孟加拉境内没有类似锡克族那样深受分裂之苦的民族（如果不算前文提过的吉大港的山区居民）。孟加拉的人民非常情绪化，他们可以很快被人煽动起来以至动武，但如果有人呼吁效法甘地的做法，他们又会迅速和解。

分裂之乱起先只涉及英殖民统治下的前印度各省，没有波及各个诸侯国。本来，所有诸侯国都有各自的体制，且互不结盟；每个诸侯国都基于 18 世纪签署的条约处于英国王室的统治之下。随着独立日的到来，王室解除了这些条约。若非蒙巴顿和帕特尔成功地迫使他们归顺，每个诸侯都将拥有自己独立的王国。但现在大多数诸侯国都加入了独立的印度。

“马哈拉亚”的意思是“伟大的国王”，这是印度诸侯引以自豪的头衔，尽管他们的国家有的只包括很少的几个村庄，收入还不如某些大地主。印度当时有 500 多个诸侯国，它们北起克什米尔，南至特拉万科，像一条带子穿越

整个印度。英帝国占领南亚次大陆时主要目标是富饶和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而把剩下的地区留给了众诸侯，因为对这些地区实行间接管理可以节省大笔费用。英政府在诸侯府内派有代办，代办的任务就是使诸侯清楚什么该做和什么不该做。就这样，“伟大的国王们”连同他们的国家一起被纳入了大英帝国，犹如琥珀里的昆虫一样。

由于各诸侯国形成的历史背景不同，英国人与众诸侯签订了互不相同的条约。部分诸侯国在 18 世纪战争中曾与英国结盟，如海德拉巴的尼萨姆。尼萨姆是穆斯林，但其绝大部分臣民是印度教徒。还有一些诸侯国在马拉提同盟解体时适时脱离出来，并和英国人签订了和平条约。克什米尔在 1846 年锡克战争后被卖给雅姆国王古拉伯·辛格，后者因而成为拥有数百万穆斯林臣民的印度族统治者。英殖民统治者根据诸侯国的地域大小和重要性，给予其领主不同的头衔与特权，其中包括在正式欢迎仪式中鸣礼炮的次数。这些等级分明的特权制度目的在于使诸侯们在各方面都保持一定距离。^④

根据新宪法（印度政府法，1935 年），诸侯们在 30 年代曾有机会确立本地区在未来印度的地位。该法主张成立一个包括原英殖民统治下印度各省和诸侯国在内的联邦制国家，同时诸侯享有亲自指派本地区议员的特权。这个计划最终流产是因为半数以上的诸侯不同意加入联邦制国家。当时有一些现实派诸侯赞同此计划，但大多数诸侯由于顾虑入盟后可能增加财政负担而拒绝加盟。英国官员更不愿见到印度作为联邦制国家出现，其鼓噪加深了反对派

的疑虑。因此，1947 年的诸侯们处于彷徨不定的境地，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行事。只有少数几个诸侯决心保持独立，其中自然包括尼萨姆。他甚至从捷克订购了大炮，以备危机时使用。

对尼赫鲁及其政府而言，局势同样难以预料。国大党在独立斗争期间一直保持克制，没有卷入诸侯国的政治纷争，目的是避免两线作战的危险。相反，共产党积极致力于对各诸侯国的渗透。它们毕竟拥有印度三分之一的领土和约 9000 万人口。无论如何，一切所为均为了使诸侯们能在独立日到来之前同意加盟印度。

内政部长帕特尔就是因为在诸侯事件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而被誉为“印度的俾斯麦”。当年，他向诸侯提出了看似相当优惠的交换条件：诸侯签署入盟条约后只需放弃主权，其它一切特权和收入均保留。此外，蒙巴顿在诸侯问题上也提供了很大帮助。距独立日还有三星期时，蒙巴顿召开诸侯大会。他身着阅兵礼服，声称最后一次扮演英王室代表的角色。他向诸侯们描述未来的前景，并急切地建议他们接受帕特尔的条件。他指出，在独立日到来之前，他本人尚可在诸侯与印政府之间进行斡旋，之后则必须由每个诸侯独立应付各种局面。很多诸侯表示愿与印政府签署入盟条约。唯有一位代表其领主出席会议的部长显得无所适从，他询问自己该如何做，因为他不知道其领主会作出怎样的决定。蒙巴顿从桌上拿起一个大玻璃球（镇纸），高高举起并说道，他正在看一个水晶球，水晶球会告诉他那个缺席诸侯的愿望。大厅沉寂了几秒钟，然后蒙巴顿郑

重宣布，那个诸侯已同意加盟印度。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冰消疑解。不久，诸侯们在帕特尔的内政部排起长队，赶在独立日之前及时签署了入盟条约。^⑤

两位管辖地域最广的诸侯——克什米尔国王和海德拉巴的尼萨姆没有签署入盟条约，而是请求再考虑一段时间。这在后来为印度带来很大麻烦。^⑥海德拉巴的尼萨姆是穆斯林，但他的臣民绝大多数都是印度教徒。尼萨姆犹豫了很长时间。他不愿选择投靠巴基斯坦，因为他的领土完全被印度包围。此外，他憎恶穆斯林联盟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后者在印巴分裂前曾拜访过他并试图寻求他的支持。现在真纳成了巴基斯坦的总督，而尼萨姆还是不愿与他打交道。另一方面，尼萨姆也对加盟印度不甚积极。1948年，帕特尔用武力解决了海德拉巴问题。印度军队在一次“警察行动”中占领了尼萨姆的诸侯国。克什米尔的大多数居民是穆斯林，与之相邻的巴基斯坦要求将该地区划归自己。但是当局势出现危机时，克什米尔的国王还是决定加盟印度。此后不久，印巴军队在克什米尔地区开战。冲突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圣雄甘地成了冲突之始的牺牲品。

甘地当然不是巴基斯坦的朋友。他不愿看到印巴分治，甚至称巴基斯坦是罪孽的产物。但当分裂终成定局时，他又认为印巴应合理分配原来共有的国库，其中巴基斯坦所得为 5.5 亿卢比。然而，国库尚未分配完毕，印度军队就在克什米尔地区与巴基斯坦军队交火了。内政部长帕特尔坚决反对向巴方支付这笔钱，认为给敌人款项是没

有道理的。甘地却一如既往地主张公平分配，并开始绝食。甘地虽未表示针对帕特尔，但后者立即作出有针对性的评论。甘地声称，其绝食运动旨在结束印度境内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仇杀，与巴基斯坦事务无关。但所有人都很清楚，绝食主要是为了那 5.5 亿卢比。^⑦尼赫鲁在该问题上与甘地意见一致，而前者与帕特尔经常在一些问题上产生分歧。内阁最终决定向巴方支付这笔款项。帕特尔只能放弃抵制，尽管他很不愿意这样做。极右的印度教徒视甘地的行为为叛逆之举，他们认为唯有杀死甘地才能阻止政府向巴基斯坦付款。

甘地的祈祷集会在其朋友兼施主比尔拉家的花园里举行，任何人都可自由进出会场。甘地几乎每天都在集会上向众人发表演讲，后来他的讲话还通过无线电转播。政府希望“民族之父”的讲话可以安抚这个躁动的民族，然而这一切被证明是徒劳的。纳图拉姆·格泽——来自马哈拉斯塔的年轻婆罗门，是印度国家自救联合会的成员，他接受了在圣雄甘地前往晚祷会的途中刺杀甘地的任务。甘地此前曾问过自己，是否有勇气面对歹徒而不立即转移到安全地带。当格泽的子弹射向甘地时，甘地站在原地，口呼神名“罗摩！罗摩！”一手触额为刺杀他的人祝福，继而倒在血泊之中，与世长辞。

蒙巴顿勋爵闻讯后火速赶往事发现场。甘地的所有主要追随者已汇集比尔拉家。蒙巴顿向尼赫鲁及帕特尔转达了甘地的最后愿望，即希望他们和解。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曾使甘地极为担忧。两位政治家听到此言，当即拥抱在

一起。应蒙巴顿的建议，他们甚至表示愿在当晚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以证明他们的团结一致。^⑧

圣雄甘地逝世后，各类冲突暂时退居次要地位，举国上下一片沉寂。政府决定重振旗鼓，控制大局。

就像多米诺骨牌游戏一样，推倒第一张牌，其余的都依次倒下。印度的独立就是这倒下的第一张牌，它引发了一系列的非殖民化运动。二战期间，阿道夫·希特勒曾对日本大使说，如果英国人失去印度，一个世界将会崩溃。希特勒本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崇拜者，他的此番谈话表达的不是他的目标，而是他的担忧。毫无疑问，没有印度，“日不落帝国”就不复存在；印度的独立意味着其他殖民大国的终结也仅是个时间问题。但非殖民化进程也不完全等同于多米诺骨牌游戏。由于宗主国的政策差别及殖民地人民不同的政治意愿，每个殖民地的情况都各不相同。脱离殖民统治阶段的政策走向往往对各国未来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印度分裂的例子中清楚地看到。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以各国的具体情况为基础，介绍非殖民化进程的多样性特点。当然还要考虑到多样性里蕴藏的共同性，如东南亚各国受日本殖民统治的相同经历，北起伊拉克、南至摩洛哥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戴高乐将军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黑非洲的争夺及其对

年间该地区非殖民化浪潮的影响。

全面了解非殖民化进程并不一定要逐一研究每个殖民地的具体情况。多数情况下，精确、直观的概述即可满足人们的需要。本书的最后三章就阐述了一些涉及所有前殖

民地国家的问题：（一）年轻国家的外交倾向；（二）年轻国家的经济发展；（三）“第三世界”的形成以及各种殖民遗产。

本书阐述的内容主要发生在 1947—1964 年间，而印度的独立和尼赫鲁的逝世则恰好标志着这段历史的开始与终结。截止 1964 年，多数黑非洲殖民地获得了独立。再次回顾殖民时代和 60 年代以后的历史看来是很有意义的。本书第一章将再次以印度为主题。1947 年夏季的欢庆之日将引导人们回首印度漫长而激烈的自由之战。较之其他众多殖民地来说，印度的独立史颇具代表性，因为其他国家的斗争规模都要比印度小得多。

第一章

英印权力交接内幕

1. 印度民族主义的开端

18 世纪时，印度被英国人占领。当时的英国只有 500 万人口，而南亚次大陆拥有 1.5 亿居民。英国占领印度之初，不是以王室的名义，而是通过一家贸易公司。尽管这家公司拥有国王授予的特权，却不能转变为主权机构。

在英国的统治下，不久，一个印度知识阶层产生了，他们对于世界舞台的风云变幻了如指掌。早在 1849 年，一位印度民族主义作家写道，英国人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否则他们会被一场革命驱除出印度，就像当年被逐出美国一样。^①早期殖民者对于诸如此类的警告不甚重视。他们坚信自己为印度带来了文明，定会为此赢得感激。直至 1857 年，一场大规模起义粉碎了他们的幻想。当时，印度军队发生骚乱，北方的农民、地主相继起义，两者结

合起来，试图摆脱残暴的殖民统治。征收苛捐杂税、强迫农民种植经济作物，滥采滥伐致使土地沙漠化等做法使农民走投无路。而在印度军队中，英国军官丝毫不理会士兵的民族习惯，无情压制任何反抗苗头。这一切使雇佣兵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骚乱。英国人可以动用武力镇压大地主和农民的起义，但对于亲手教会他们使用现代化武器的士兵却束手无策。两股反抗力量的结合几乎使殖民者失去印度。但是他们找到两点可乘之机：一是起义者实际上处于无人领导的状态；二是锡克人乘机向雇佣兵发起进攻，为曾被雇佣兵打败的上一代锡克人报仇。1857年的起义后来被分割为小范围冲突，但英国统治者失去了原有的乐观。他们不再视印度人为充满感激之情的臣民，而是必须严加防范的叛逆者。

印度新的知识阶层没有参与这场起义，而起义即使获胜他们也不会被起用。这使他们的民族主义热情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有所减退，直至1870年他们才再次崭露头角。当时的保守派副王里顿勋爵无意中为民族主义运动做了贡献。他由于担心报纸会煽动民众起义，决定取缔一切印度文版的报纸。为此，印度记者必须转向英语刊物，而这大大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人们开始研究英国哲学家的自由思想，并以这些思想为理论依据抨击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1885年，印度国大党在孟买成立，印度各地都派代表参加，这标志着自由立宪民族主义的产生。不久，另一种民族革命思潮崛起，其代表者认为印度有史以来就是独立的国家，现在只需摆脱外来统治，重新获得自决权。一

些民族革命派甚至采用恐怖手段，但是谋杀一两个官员并不能彻底改变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上述两个阵营都谋求建立民族团结，并为此寻找民族自决的历史渊源。这种“团结传统主义”在当时是一个时髦的现象。^②它与传统主义有别，后者只是主张抓住历史不放。第二个意义的传统派当时自然也存在，但他们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几乎没有发挥作用，甚至反对该运动。其中印度教传统派是旧时代等级制度及家族管理的卫道士，他们视现代的团结传统派为眼中钉，因为团结传统派只重视那些能体现民族团结的传统。

寻找可用的历史渊源并非易事。人们回顾了伟大的史诗、民族英雄及没落的帝国，但几乎不可能找到同时适合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历史，而对历史越来越细致的研究反而把人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自 1881 年起每 10 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使人们注意到不同种族在人口数量上的强弱对比。穆斯林担心永远无法在人数上超过印度教徒。英国人也迅速意识到这种担心可以为己所用。

2. 圣雄甘地领导下的自由之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圣雄甘地领导下的国大党似乎找到了建立民族团结的另一条道路。甘地不再寻求可利用的过去，而是致力于当前的政治运动。他将自己在南非时形成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运用到印度的斗争中来。“非暴力不合作”意思是宣誓完全摒弃武力的单个人的各种行为。

而群众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由这些个人组成，运动的力量不是来自集体，而是源于参加运动的每个人的信念。但是甘地犯下一个政治错误。他将自己的运动与印度穆斯林的“哈里发”运动联合起来，试图用这种方式促进民族团结。由于哈里发运动领导人，如毛拉纳·阿萨德，与甘地在非暴力原则上恰巧一致，甘地觉得被他们吸引，并与他们一起发动斗争。^③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助长了反动倾向的滋生，因为哈里发主义者主要致力于保卫上土耳其哈里发的过时机构。不久，土耳其取消了这些机构，这使哈里发主义者深为失望。然而失望之余，大多数穆斯林没有转向印度的民族自由斗争，而是与其保持距离，并谋求加强伊斯兰教在印度的地位。曾警告甘地不要将哈里发主义者与自己混为一谈的真纳，这时却陷入伊斯兰反对势力的漩涡，继而爬上了其最高领导层。^④

在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革命中，即 1930 年的一次全国性公民不合作运动中，甘地成功地向英殖民统治者展示了国大党的力量。他发现了一部极易使人触犯的法律。这部法律保障殖民政府对食盐贸易的垄断，并视私人制盐为违法行为。甘地于是呼吁民众拒购官卖食盐，自己动手制盐。继甘地发起此次运动之后，印度各地几千人竭力效法他，许多人因此被捕入狱。此外，当时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印度农产品价格下降了一半。农民不堪忍受税收和租金的重负，很多地方爆发起义。国大党乘机吸纳他们入党，并从此成为农民党派。^⑤甘地自 1920 年起就致力于扩大国大党在农村地区的影响，现在他终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